

国际分工视角下的中国工业优势 ——中国工业的供给侧结构改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时杰

摘要：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际产业分工进入第四次转型，低碳经济呼之欲出，中国工业在外部环境、工业体系以及发展空间等方面具有极大的发展机遇。中国工业的供给侧结构改革要从价值链、产业链和资金链同时入手，长短搭配，补齐短板，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占领价值链制高点，拓展中国工业的产业链和拓宽中国工业发展空间，改善中国工业的资本结构，同时推动财政体制改革，使中国工业发展供给侧和需求侧协调发展。

关键词：中国工业 国际产业分工 供给侧结构改革 风险与对策

国际经验显示，一个国家工业化进程需要对外有产业发展安全环境，对内有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尤其对于工业化追赶型国家，需有一定产业积累，包括技术、工业体系和资本的积累，再进入国际市场，工业化进程才能成功。新中国建立后，经过60多年的发展，尤其是以加入WTO为契机，中国工业在国际产业分工格局里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又到了转折关头：以2015年底美联储加息、美国解禁石油出口、联合国气候峰会巴黎会议为标志，国际产业分工进入第四次转型时期，中国工业如何才能占领国际产业分工的制高点？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如何发展？这是供给侧结构改革需回答的问题。

国际产业分工四次转型

从人类18世纪中后期进入工业时代以来，国际产业分工格局经历了三次变化：拿破仑战争之后，以英国为主导国际产业分工体系；美国内战和普法战争后，形成了英国和新崛起的德国、美国共同主导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二战以后，以美国主导的国

际产业分工体系（表1）。

推动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变化的因素

一是，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工业化国家的制造能力空前发展，而国内需求不足，必须依赖于国际市场。国内供需失衡，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导致市场失灵后，往往是通过大规模战争之后达到国际产业分工再平衡。

二是，国际产业分工从生产效率角度分析都伴随着巨大的科学技术进步。这些科学进步又进一步推动国际产业格局供给侧长足发展，推动生产力进步。

三是，国际产业分工从分配环节以相应的国际金融制度安排相匹配，并以相应的经济学理论为支撑。由于不存在世界政府，工业化创造的财富分配往往通过主导国家制定规则的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实现，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通过征收“铸币税”的形式获得最大分配份额，这种分配模式的持续性会随着生产力达到极限而出现失衡状态。经济理论创新滞后于国际产业分工格局的变化。

表 1 历史上三次产业分工情况

	主导国家	贸易规则	国际金融规则	理论基础
第一次国际产业分工	英国	自由贸易	金本位与英镑体制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第二次国际产业分工	英国、德国、美国	贸易保护	金本位与英镑体制	新古典综合、法兰克福学派
第三次国际产业分工	美国	自由贸易	美元体制	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供给学派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推动国际产业分工第四次转型的因素

2008年9月15日，以雷曼兄弟破产为导火索，国际金融危机正式爆发。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是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中供给侧和需求侧不平衡造成的，具体来说是三重不平衡的结果：

产业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以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工业发展突飞猛进，发达国家普遍出现产业空心化问题，而进入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利用现有技术和资本，工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展。

国际产业分工分配的不平衡

本轮全球化进程在上世纪80年代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创造了巨额财富，这些财富大多数以知识产权专利费和金融工具等分配形式流向发达国家，导致后工业化国家内需不足，对外依存度偏高。

发达国家内部收入分配的不平衡

发达国家，尤其是美英在里根年代推动以削减社会福利、推动金融创新为标志的“供给学派”改革，导致国内收入分配格局恶化，国内财政收支失衡，最终演变为美国特色的个人债务危机和欧盟特色的政府债务危机。

发展中国家制造，发达国家消费，发展中国家劳动过度补贴发达国家资本的格局面临内在矛盾，到了爆发阶段，世界经济就需要再平衡，国际产业分工的旧有格局供给侧和需求侧都需要新的制度性安排，但相对而言，从供给侧改革比较可行，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到了第四阶段。

第四次国际产业分工与前三次的比较

根据本国产业发展的优势和利益，美欧日从供给侧分别提出“产业回归”、“再工业化”和低碳经济。虽然具体策略有所差别，但美欧最终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达成了高度共识，美国希望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占据高端，即低碳产业的产业标准控制、绿色金融的规则和贸易体系重构方面占领产业链、价值链和资金链制高点。欧盟希望在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取得产业优势，包括采取改进生产效率方面取得竞争优势，重塑欧洲制造业。

但这次国际产业分工变化与以往三次国际产业分工有着显著不同的特点。

国际产业分工格局调整的环境方面

产业分工是在相对和平环境下进行调整的。以苏联解体为标志的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大国之间战争可能性极低。中国是二战的战胜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建设者和维护者，世界经济再平衡过程必须考虑中国的利益和中国工业发展。

国际产业分工从供给侧效率分析

总的来看并没有明显的科学原理突破为支撑，无论是信息技术还是低碳技术，使用的仍旧是20世纪80年代的原创技术。发达国家在技术方面没有绝对遥不可及的产业技术优势，这对于处于提质增效爬坡过坎阶段的中国工业发展来说比较有利。

国际产业分工从分配角度分析

原有的国际金融体系和贸易制度安排急需转变，但这种利益格局的调整中，发达国家在做提前布局。美国仍旧希望在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分配格局处于主导地位，其核心战略是石油美元成功转型为碳美元。美国认为可以此重新确立国际金融体系的主导地位，掌握全球资本流向，继续在2020年

例证之一：2011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与硅谷杰出人物会餐，每个人要求提一个问题。当乔布斯开始讲话时，奥巴马打断了他，提了自己的问题。奥巴马问：“要在美国制造 iPhone 应该怎么做？”“为什么这些工作不能回美国？”苹果高管们认为，在海外生产不只便宜，而且海外有大量工厂，还有弹性、勤奋、高技能员工，各方面超越了美国，对于大多苹果产品，美国生产已经不再是可行的选择。http://www.kaixin001.com/repaste/46731634_6162678825.html

以后享受向全世界各国征收铸币税的权利，从而从全世界获得资源，加强本国在工业标准方面的优势，并以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北美自由贸易区和跨大西洋贸易伙伴协议逐步代替原有世界贸易组织，重构国际贸易制度。

中国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利条件

今后五年，也就是整个中国“十三五”时期，世界经济处于转变的关键时期，尤其就国际产业分工供给侧改革而言，转变在即。但与工业革命以来历次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不同，中国工业发展开局有利：在本轮的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中，从工业发展外部环境而言，中国是国际产业分工结构调整的主动参与者而不是被动接受者；从工业发展的技术条件和资本条件上说，中国工业发展具有后发优势；从工业发展基础而言，中国具有门类齐全的工业部门和广阔的市场空间。中国工业供给侧结构改革需要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

拓宽工业发展空间优势

我国工业的庞大产能，需要国际市场支撑，在新形势下，我国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和亚太自贸区战略，为我国工业发展空间拓展创造有利环境。“一带一路”战略核心是“取势西北，取利东南”，“大陆朝西”，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能源与矿产资源充沛而普遍工业落后，中国与这些国家展开国际产能合作，不仅更充分的利用国际能源与资源，也可以为中国工业未来发展奠定能源资源基础。“取利东南”，海上丝绸之路各国，东南亚国家人口众多而资本缺乏，如果作为产业转移，会成为中国的潜在竞争对手，而作为海外市场则极具潜力；我国与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为我国工业发展打开更多的海外市场。

高低搭配、协调发展促进工业生产效率提升
中国工业发展效率提升首先是新技术与传统产

业的发展融合，在技术追赶领域，中国工业具有后发优势，互联网+工业，助力中国工业提升生产效率。工业效率的提升还包括延伸产业发展链条，以“范围经济”带动“规模经济”，以产业链条延伸推动消化过剩产能，尤其是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造良好产业环境，发展更多长链条的新业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中国工业2025。充分发挥中国工业的发展潜能，在新能源、新材料、电动汽车、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大数据等新兴产业分工中占领国际产业分工生产环节的制高点。

产业区域布局潜力比较大

我国工业发展前三十年，尤其是一百五十六项和大三线建设，重点项目主要分布在北方，为今天的中国工业区域布局调整打下了良好基础。尤其在东南沿海工业发展受国际经济环境影响，进入调整时期，中西部工业发展的区位优势日渐明显，以我国目前工业发展速度最快，效益最好的重庆为例：2011~2014年，重庆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始终保持两位数增长，年均增速达到13.3%，高于全国同期增速5.3个百分点。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目前，惠普、宏碁、东芝、广达、仁宝、巨腾等科技企业都已入驻重庆，形成了超过5000亿元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重庆的笔记本电脑产量已占全球的1/3强。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及汽车产业集群正形成重庆发展的两大支柱。当年大三线建设布局的电子产业和汽车产业，在今天的市场经济环境下，通过适当的政府产业引导和金融支持，正发挥出巨大的潜能。

国际产业分配格局总体对我国工业可持续发展有利

世界上没有全球政府，全球产业链创造的巨额财富在各国之间以国际金融的形式进行分配。中国工业发展有独特优势，由于工业发展的各项实力，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承担稳定国际金融环境的国际责任，在新一轮的国际金融秩序构建中逐步有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亚洲基础

建设投资银行的顺利落地，为我国工业发展的国际产能合作提供了有利的金融支撑，而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更是战后国际金融秩序变革没有过的先例，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为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可持续争取到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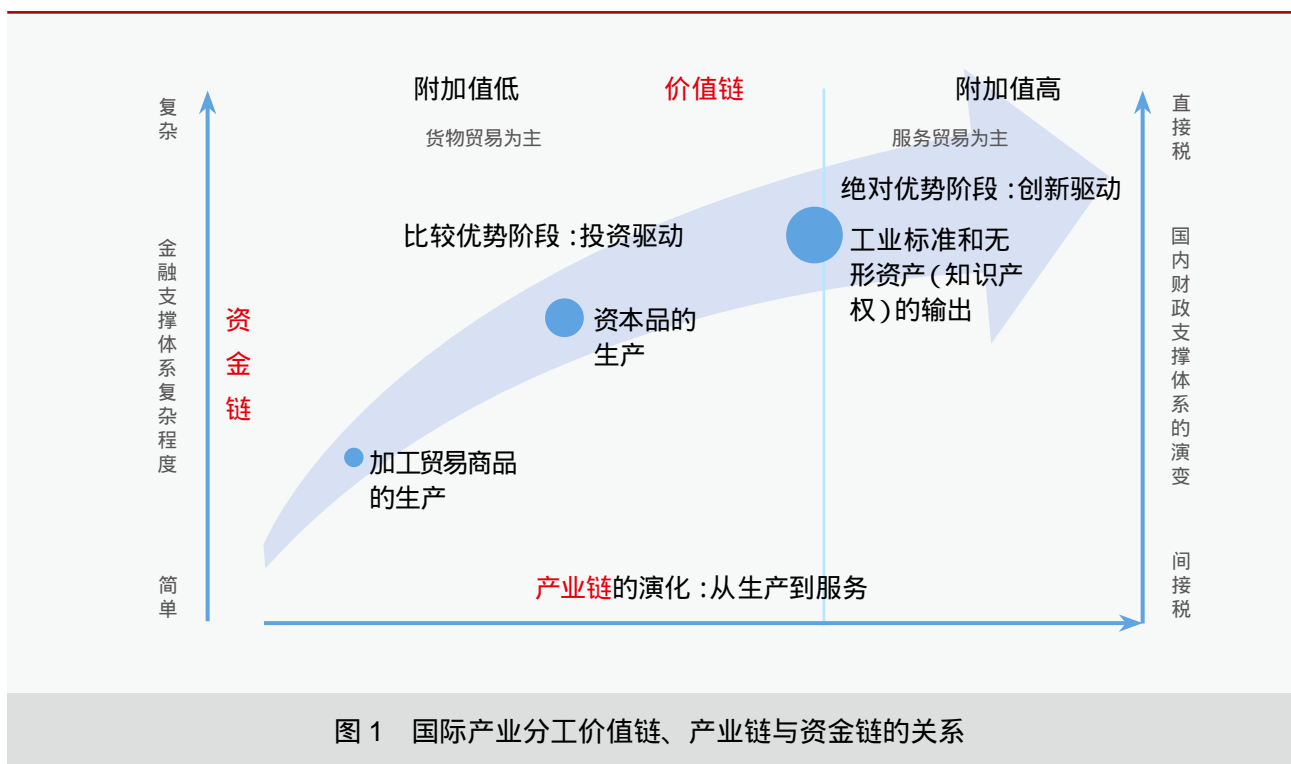
中国工业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风险与对策

尽管本轮国际产业分工调整的趋势中，从产业发展、贸易规则、金融体系，整个国际产业分工格局的变化对我国工业发展有诸多利好，但有利的发展格局不会自动的转换成我国工业发展的优势，也蕴含着一些风险，包括：国际市场萎缩和动荡的风险；产能过剩的风险；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风险；金融环境系统性风险。这些我国工业发展中的风险，从供给侧上说是我国工业在国家产业分工价值链、

产业链与资金链三条链条短板造成的（图1）。

价值链是工业发展的长期定位，从价值链上看，我国的工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中下游，面临欧盟、日本强大的制造能力和美国工业标准控制能力的双重挤压。主要问题是工业标准控制能力比较弱，需要突破关键技术，此前李克强总理在一个座谈会时举例说，中国至今不能生产模具钢，比如圆珠笔的“圆珠”都需要进口。中国每年圆珠笔的产量是380亿支，占全世界总供应量的80%，但笔尖珠芯近90%来自进口，每年需花费2亿美元外汇进口。

产业链是工业发展的纵深，上下游延伸不够，短板比较明显，尤其是服务型生产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充分，导致工业生产低水平重复建设比较突出，很多工业产品只有规模经济而没有范围经济，发达国家的装备制造业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已经开始由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过渡；全球500强企业，20%的制造企业的服务性收入超过其总收入的一半。而在中国，装备制造企业的服务收入



http://finance.cnr.cn/gundong/20160115/t20160115_521148539.shtml

在销售收入中的比例还只有 5%~10% 左右，我国工业服务化发展潜力巨大。

资金链是工业发展的短期制约因素，从资金链角度而言，我国工业企业资本结构问题突出表现为负债率过高，去杠杆难度大，这是由于价值链上的不利地位，产业链上纵深不够，导致必须以量取胜，以规模要效益，导致固定成本过高，固定资产投资融资只能依靠间接融资，由于我国的间接融资市场发育不全，国有银行独大，债务产品结构比较单一，企业融资主要依靠债务资本，刚性成本过高，一旦外部市场销售出现问题，由于经营杠杆的作用，会导致亏损加大。

应对中国工业发展供给侧的风险，更要以创新的思路，按照“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总体要求，推动供给侧结构改革，挖掘我国工业发展的巨大潜力。重塑中国工业的新动能，发展中国工业的新业态，创新中国工业的新模式。

短期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从工业发展的资金链入手，即改善工业企业的资本结构：未来 2 年内应对动荡的国际金融环境，对外加强国际金融政策协调，对冲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化带来的风险，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参与全球治理；对内根据国际资本市场走向，逐步实现人民币自由浮动，放松利率管制，针对我国工业企业债务负担过高，债务期限不合理的现状，积极稳妥推进企业债券市场发展，鼓励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以金融创新作为“去杠杆”的重要手段、增大工业企业的流动性，降低资金成本，化解由于短期资金链收紧带来的风险。

中期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打造工业发展坚实的产业链入手。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指引下，加强资本输出，尤其是中国西北的五个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为中国工业未来发展奠定良好的资源能源基础。未来 3~5 年，以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为抓手，推动与中国北部的中亚国家展开产能合作，为中国工业产业链向上延伸打下基础，拓展中国发展空间，同时在国内推动企业兼并重组，鼓励企业向上下游产业链延伸，以并购重组推动“去产能”对工业发展持续性最为有利。以互联网+实业，推动三产融合，尤其是工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服务化制造业和生产型服务业。以“核心制造+成套服务”的模式，实现从卖产品到卖服务的跨越，从而为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闯出一条“智造”之路。不只是卖一台产品、卖一组产品、卖一条生产线，而是要为客户量身定制，提供工业解决方案。发展新业态，可以从横向拓展我国工业的产业链，推动我国工业发展从规模经济发展型向范围经济型发展，有效化解过剩产能。

长期而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在未来 5 年内更深层次的内外发力，抢占国际产业分工价值链制高点。即将到来的国际产业分工第四次格局变化，中国工业发展面临空前发展机遇，正如习近平主席在 2016 年新年贺词中指出的：“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抢占国际产业分工价值链的制高点，中国工业“补短板”可以三条路径同时进行：一是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制造环节补工业 3.0 和工业 4.0 的课；二是发展绿色产业和绿色金融，从国土整治，水源治理入手发展绿色产业，在全球日渐兴起的低碳经济发展浪潮中，从绿色制造到绿色金融的国际产业标准、国际贸易规则、金融体系方面营造国际合作良好环境；三是亚投行和丝路基金打出组合拳，积极输出人民币资本，在中亚国家发行人民币债券，输出人民币信用，牢牢掌握欧亚大陆 20 多亿人口的大市场。☞

（责任编辑：王芬）